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帝国主义 与依附

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E

(修订版)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Theotonio Dos-Santos) 著
杨衍永 齐海燕 毛金里 白凤森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帝国主义 与依附

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E

(修订版)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Theotonio Dos-Santos) 著
杨衍永 齐海燕 毛金里 白凤森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主义与依附 /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Theotonio Dos - Santos) 著; 杨衍永等译. -- 修订本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书名原文: 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e

ISBN 978 - 7 - 5097 - 9607 - 8

I. ①帝… II. ①特… ②杨… III. ①帝国主义 - 研
究 IV. ①D03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6664 号

·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

帝国主义与依附 (修订版)

著 者 /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Theotonio Dos - Santos)

译 者 / 杨衍永 齐海燕 毛金里 白凤森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刘学谦 楚洋洋 肖世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69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607 - 8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16 - 7543 号

定 价 / 1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Portuguese language edition by
Theotonio Dos - Santos. The book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Fundación Biblioteca Ayacucho 出版社 2011 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名 王 巍 李 扬 李 强 李永全 李剑鸣
李培林 张宇燕 张异宾 陆建德 陈春声 卓新平
罗志田 季卫东 周 弘 胡正荣 俞可平 黄 平
曹卫东 蔡 昉 潘家华 薛 澜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20周

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学术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作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推动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学术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修订版序

我很高兴能接受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邀请，给《帝国主义与依附》第三版撰写序言，这本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领域相关议题中的经典作品。但需要反复思考其中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时效性。由委内瑞拉阿亚谷卓图书馆出版社和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联合出版的西班牙文版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类经典图书”，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与依附》原文被收录进西语版的《作品集》中，这部《作品集》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在线推出。虽然距本书第一次出版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各方对这部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时效性。四十年了啊！

为了准备这篇序言，我重新阅读了这本书，尝试概括主要论点，重新肯定了第一版的理论、方法论和分析法。我可以毫不吹嘘地说，虽然在这四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书中的基本概念，比如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运用得极其成功。

首先，我想谈一谈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很突出，甚至被他的很多追随者否定。即通过不同的抽象层次引导对社会现象的感知（广义上是知识）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些不同的层次我们可以接近事实，将抽象的能力融入社会动力或是具体的历史动力之中。科学知识从具体出发，但抽象只能通过回归具体才能得以实现。

这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论点，即寻找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规律，与后来致力于更具体地解释历史上多种社会结构动力的理论分析区别开来。比如帝国主义这一全球性社会现象的出现（帝国主义的出现甚至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萌芽），国际分工、垄断的出现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认为社会经济规划和国家干预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必要手段。

在“西方”，大部分战后经济政策都瞄准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认为

现代政府有义务保证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然而，“西方”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殖民战争纳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动力的范畴。这样就形成了20世纪纯粹意识形态的版本，该版本把这个世纪形容为积累、财富扩张和福利的时代。战争与成万上亿的死者一起成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无关的现象。纳粹法西斯主义也被解释成错误的行为和价值观。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理论分析所做的努力被掩盖了，他们预见到了世界大战的趋势。这是资本积累到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尽管殖民战争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关键要素，但马克思在他关于对殖民地印度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经典分析中，将受制于殖民利益的物质进程及其暴力、血腥、充满了贫穷和死亡的特点纳入扩张进程之中。

这些预言由第二国际收录，预言证实在19世纪末期，可以将马克思的伟大理论应用于社会阶级斗争之中，并指出工人阶级可以发展高水平的政治组织。尽管马克思的政治目标十分宏大，但是工人已经在国内开展阶级斗争，通过革命斗争取得身份认同，并通过建立工会和强有力的、有国家执行力的政党来实现民主。不能忽略工人与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府中建立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间的关系。这已经有了前车之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主要的哲学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强调这一点是阶级斗争的基础：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这使得社会主义党派于20世纪20年代在自由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工人政党决定倒向国内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破裂。在社会结构这一抽象水平上理解可能的或是必然的历史变化是十分必要的。社会结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社会学思潮。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社会主义党派或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出现和消失，以及19世纪末社会主义党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力量的加强，使得政治焦点汇聚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之中：在由欧洲资产阶级组建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转型的具体可能性。这样的辩证观点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冲击，引发了非常消极的分歧。在民族国家内部，推动理解经济动力与政治动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权重与直接了解社会经济资料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料将为历史时机的分析打开新的领域，在该领域中社会实践、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精神实践和文化实践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织，并全面依赖于具体的人类活动。因此，在能决定运

动性质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之下，社会经济学分析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这种具体情况并不会削弱理论观点，这是从具体情况中抽象出概念的艰难过程。这些具体情况是不准确的。然而，由于普遍规律的限制，它们无法自由发展^①。

目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具体的社会团体，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变成了科学分析的目标。但是，这些社会力量的利益越明确，越会转化为政治宣言、政治口号或公会口号、党派纲领以及其他诸多表现形式。伟大的社会团体，尤其是为理论和经验研究等精神产品源源不断打下基础、并以此作为其利益所在的社会阶层，表现出了政治意愿及历史意愿。他们研究的价值体系被应用于化解相互对立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他们还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研究意识形态的形成。我认为运用布哈林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时提出的阶级心理概念能够对此进行更好地理解。

物质需求转变为主观需求，最终被自上而下地表述为公共政策以及政府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在极端复杂的历史辩证法中自下而上产生的压力。

历史进程和有一定意识的人类活动让我们打开了通往智能之路，智力日益成为人类进化的决定因素。让我们打破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抽象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只能有限地动员人民。社会科学会转变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

方法论的进步意味着我们的科研成果有着日益坚实的基础，并精确地勾勒出《帝国主义与依附》以及其他同时期作品的雏形。然而，这个时期的作品能取得极大的进步归结于当时风云诡谲的局势，这种局势几乎决定了我们所有的生活。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巴西人民的民主进程不断地深化，并引发了一系列

^① 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引文中有很好的体现。然而，这篇引文没有随书出版。20世纪30年代，这篇文章作为草稿流传于世，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巨大变革。关于这个议题的思考，我写了一篇名为《社会阶级概念》的文章。1968年，这篇文章第一次在智利大学的一本小册子上发表，后来被收录于《社会阶级概念》。这本书在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合法或是秘密出版。2016年，它被收录进我的《作品集》，《作品集》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1970年，该文的英文版在《科学与社会》杂志（1970年夏季号，总第34期，由Henry F. Mins翻译）上刊登。我还推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文。两篇文章都被收录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批判性修正》。2011年，该书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卢森堡出版社出版。

的斗争。一些历史事件也因此受到影响。此外，在1964年的巴西政变中，人民民主进程被当权的帝国主义势力打败，我们被迫转入地下，直到1966年我们去智利避难。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把我们带到智利大学经济系的社会经济学研究中心，让我们创建依附问题的研究小组。在此期间，由于我曾经在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六个月的教职工作，因此能与外界保持联系，而且1968年迎来了全球反抗运动的高潮，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不与世界脱节的前提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

我加入了智利社会主义党，并参与创建了“智利今天”研讨小组，这个左派小组极力支持对当前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思考^①。很快，由于针对萨尔瓦多·阿连德发起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1973年，智利政府把我写进了第一份通缉名单，我不得不到欧玛尔·托里霍斯总统领导的巴拿马共和国的使馆寻求庇护。我很快在墨西哥得到了政治庇护，在那里继续进行科学和策略思辨，一直到准备写这本书，其中的数份材料是从血腥暴力的智利政变分子的屠刀下救出的。

也许本书没有直接反映这些经历，但是我能肯定这些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创作。因此，读者们也许会觉得本书的结构非常特殊。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连续的方法论循环中，我们从最抽象的部分谈到最具体的部分。在解释本书内容的引言之后，我们引入了本书的第一个部分，标题是“当代帝国主义及其矛盾”。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极好地应用了社会结构的概念，将分析与国际背景相结合，正如将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关系相结合，并呈现出矛盾与和谐并存的特点。

现在常提到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很少提到社会主义的模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希尔费丁说明了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新历史阶段的作用，布哈林强调了国际分工、金融资本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这三者对资本主义新阶段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来说也是必须的。卡尔·考茨基提出资本整合和扩张的进程通过大公司的资本扩张得以体现，但忽略了其中的内部矛盾。列宁用一个具体现象佐证了这个观点：世界大战。这些内部矛盾引发了俄国革命、殖民地国家的反君主制度革命（比如中国的孙中山领

^① 我在智利加入“人民团结”阵线的材料被收录在《见鬼的危机！阿连德的智利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2009年，本书由加拉加斯艾尔佩罗·伊·拉拉纳出版社出版。可供下载。

导的革命)，等等。

在新时期，资本引发了生产力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试图展现这些变化对当代社会结构形成的影响，以及对阶级斗争新形式的影响。为了保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而发展，无产阶级艰苦抗争，与此同时，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由于工业革命和自我觉醒，无产阶级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那样，围绕着领袖人物组成小团体。

19世纪末，恩格斯强调这是资本主义的新时期，因此，也是新兴工人阶级的新时期。新兴工人阶级有能力挑战现行的经济、社会秩序，却是由工人阶级中的精英组建而成。这是由于受到了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制约。全新的社会结构也促成了二十世纪初新的力量对比。这意味着“永久革命”战略的根本性变化。在“永久革命”策略中，革命的工人阶级是社会力量以及政治力量中的少数，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将革命带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新阶段。工人阶级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公会和研究中心，并争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霸权以及直接领导权。运动策略变成了“大多数人的革命”，恩格斯给这一策略赋予了逻辑并强调资产阶级放弃了民主自由理想。这难道是纳粹法西斯主义作为大资本意识形态出现的前兆？^①

本书第一部分的理论和经验论深入研究了全球技术和经济集中化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形成和扩张直接影响了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并在世界经济范畴内形成了新的分工，而跨国组织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母体。世界经济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得以发展。这个过程建立在资本集中的基础上，这同社会变革的形式主义观点是背道而驰的，而资本的集中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民族国家有强大的实力，区域一体化促成了欧盟的成立，这是本书第一版出版之时国家间权力集中的最高表现形式。

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推行垄断之间的矛盾。垄断的推行完全依赖于美国在全

^① 关于社会主义策略和战术的研究被收录于与 Vania Bambirra 合著的《社会主义策略和战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宁》。1980年，该书由墨西哥城的时代出版社出版。关于依附条件下的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被收录于《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依附的新特点和拉丁美洲的两难境地》。1967年，该书由智利圣地亚哥拉丁美洲出版社出版。其他国家还发行了阿根廷版和委内瑞拉版。该书也被收录进我的《作品集》中，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可供下载。

球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不断干预。世界经济愈发失衡，但愈发多样化。

我为世界体系理论做出过一点特殊的贡献。本书第二部分分析了帝国主义的长期危机。我和曾经一起共事的同事一起研究马克思理论，^① 深入研究了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影响。19世纪康德拉捷夫发现了长周期，并提出了资本积累的概念。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是革命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参加过俄国革命，重申农民经济的重要性。他在领导经济研究中心时证明了，至少从19世纪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长周期（15年到20年的上升期和15年到20年的衰弱期）的特点。

苏联的政治斗争终止了他的深入研究，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终英年早逝。但数据证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持续性。1930年，熊彼特在一本关于世界危机的重要作品中提到了他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几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熊彼特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出优秀的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初，我着手深入研究长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挑战了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需要有所扩充。他已经证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意志体现。资产阶级将经济现象视为基本概念的核心，并不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积累的关键。与之相反，“经济学家”们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发掘“经济平衡”的条件，该条件由自由市场规律决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它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过去及现在的根源在于“经济学”“外部”的因素。

我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体现，我无法在本段中简要概括。我认为，要预测那几年的进程，用“社会结构”概念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结构的概念更好地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形势，其中的长周期理论有着显著的重要性，该理论对不同社会结构的“演化”趋势有很大的影响。社会结构向通过跨国组织表现的帝国主义，垄断经济以及引导垄断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发展。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支持着并不存在的“自由市场”，并服务于大资本和在全球扩张的垄断市场。

我们还指出了金融资本在这一全球进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之后的许多研究都导向未来学以及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间的关系，并开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领域。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集中研究了长周期和技术范式之

^① 由依附理论衍生的讨论被收录在《依附理论：总结与观点》一书中。2002年，由墨西哥城的普拉萨·伊·哈内斯出版社出版。本书也被收录于我的《作品集》。2015年，《依附理论：总结与观点》最新的葡文版由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岛屿出版社出版。

间的关系。初级的技术创新很快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中级的技术创新。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也与科学周期息息相关。20世纪40年代，科学统领了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针对科学技术革命对现代资本主义巨大影响的研究领域。针对这个话题，我们在本书中进行了大致的描述，并在之后的诸多作品中进行了阐述^①。

本书的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讲述了依赖于世界体系，并处在世界体系边缘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世界体系日趋一体化，同时又充满了矛盾。不同于那些保守的“科学家”想强加于我们的结论，我们的分析并没有得出平衡世界体系的结论。我们所看到的是，全球化新阶段意味着矛盾的深化，这些矛盾同当代世界体系有相同的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结构中，社会力量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并为其意志的实现而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世界体系和当代世界体系争夺着霸权。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很遗憾，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中心能够采取批判的观点，让人类社会达到和平的更高境界，取得人文的、可持续的发展。

我曾经历过紧张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正如此时巴西经历着的动荡，但我依然继续研究这个话题。在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依附》之后，中国社科院还翻译了我的其他几部作品，还让《帝国主义与依附》这本书更上一层楼。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革命理论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进一步解释了有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辩论，强化了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研究。我们还试图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美欧霸权深陷危机的背景下分析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概括了本书的论点，并将其纳入葡文版的《发展与文明》^②一书版。在《发展与文明》中，我们强调了发展中的中国在全球文明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已经为全球文明的建立奋斗许久。

我想，读者在阅读或是重新阅读《帝国主义与依附》时会感到满足。至少，这将会是一场并不平静的智力冒险。（林叶青 译）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写于2016年9月

^① 我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成果分散在多本书中。推荐感兴趣的读者在线阅读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的我的《作品集》：<http://ru.iiec.unam.mx/3105/>。

^② 我的作品《发展与文明：向塞尔索·福尔塔多致敬》已被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编辑成电子书：http://biblioteca.clacso.edu.ar/clacso/se/20160330040647/Desenvolvimento_e_civilizacao.pdf。

中译本序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是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书中对依附的概念、依附的形式和依附的结构做了较为系统和权威性的阐述。尽管这部著作只是反映了依附理论的初期思想，但为其他学者后来更加深入具体地研究依附问题打下了方法论基础。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表现形式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依附理论则研究这种扩张的后果，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外围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积累总进程的影响。依附理论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既把依附现象放到帝国主义理论的总框架中来考察，又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来研究，以揭示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扩张对象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外围的特殊表现形式。由于上述特点，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被看作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因此也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

从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来看，依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依附论”和“结构主义依附论”两大流派，两派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综合趋势。狭义上的“依附论”一般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战后国际关系中新的依附形式的理论，包括多斯桑托斯在研究帝国主义新特征和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新变化后提出的“新依附理论”、巴西学者鲁伊·马里

尼运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不发达国家的表现形式时提出的“超级剥削理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运用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运动与劳动人口结构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新的表现形式时提出的“边缘化理论”，以及瓦尼姬·班比拉在对依附性资本主义进行分类研究时提出的关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分类方法。“结构主义依附论”的前身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形成的由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的“二元结构主义理论”和胡安·诺约拉的“外部失衡理论”构成的早期依附理论或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60年代期间，在外部依附论的批评和内部自我批评的推动下，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获得更新和发展，在拉美经委会内部形成了阿尼瓦尔·平托的“结构异类化理论”、佩德罗·布斯科维奇的“收入集中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的“外部依附理论”、奥斯瓦尔多·森克尔的“支配-从属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依附论”。

两派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在于都采用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有明显区别。“依附论”的革命色彩较浓，从不回避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研究问题一般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范畴为基础，结合拉美国家的现实，创造一些新的分析范畴和概念，以证实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性，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比较直截了当。“结构主义依附论”的改良色彩较浓，虽然也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但也吸收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某些改良主义成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本质和矛盾的揭露和批判比较含蓄。在基本观点上，虽然两派依附论都把依附问题看作是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扩张和巩固相联系的现象，但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不完全相同。“依附论”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认为依附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主义依附论”则强调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强调外围国家内部非资本主义的落后结构与先进结构的并存关系，认为依附是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被动后果。在政策主张方面，“依附论”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内部结构来实现经济的自主发展，“结构主义依附论”则主张通过国家计划干预和民众参与改革国内和国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来实现资本主义体系内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两派依附论中，依附谁，对依附状况的分析具有

较强的说服力，但在克服依附的主张上却仅仅停留于泛泛地强调革命原则的有效性，而忽视了在具体现实条件中的可行性。

针对两派依附论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巴西学者卡多索和智利学者法莱托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将两派依附论的优点综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完善。一方面，在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系统地将社会学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之中，特别是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拉美社会的依附问题 and 经济发展问题，强调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以及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性质，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结构性条件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合形式具有不同的意义，强调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时期结构和历史的差别，强调依附结构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在基本观点上，强调依附与发展并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而是一个同时发生的过程，指出既要看到在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改组推动下出现的新的国际分工给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开辟了可能性，又要看到依附性发展的特点、矛盾和后果；既不能纯粹以意识形态的理由拒绝已经发生的经济进步，又必须使人民依据自己的政治价值和目标意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和民族的依附问题。在政策主张方面，认为应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依附性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依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扩张与拉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汇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资本主义逐渐由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在大垄断资本的集中化、集团化、中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第二，垄断与国家的关系日益强化，以至于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资本输出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心国家在外围国家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及其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成果的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独立；第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加强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与此同时，在早已获得政治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也由自主的民族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这种发展造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导致政治上民族民众主义时代的终结和官僚权威主义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依附形式的变化和依附程度的加深。面对这种变化，西方的现代